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陈忠实 李继凯



【第二十七册】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延安作家（三）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二十七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 陈忠实 李继凯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延安作家（三）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柯 岗

传略

柯岗(1915—2002),原名张柯岗,笔名柯岗,曾用笔名:康任愚、葛岗、柳斜晖等。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军事文学作家。1937年大学毕业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而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人民日报》编委、记者,新华社编辑、野战部队记者,第二野战军十二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支社社长。

1915年农历六月初六,柯岗出生于河南省巩县北氓山顶的张家岭村。其父张荫南为当地名医,思想开明,支持革命。柯岗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又在就读中学时通过阅读文学读物接触了革命思潮,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1933年柯岗到上海中国公学预科选学中国文学,翌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深造,1937年毕业。虽然在大学期间学过医学和政治、经济,但他始终对文学情有独钟。

当柯岗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他断然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投入到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在上海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难民的转运工作,9月达开封,致力于学生抗日运动。曾与曾克、黎辛三人一起创办了《争存》半月刊,后投笔从戎,在大别山南北的麻城、商城一带,进行抗日的组织、宣传活动。

1938年武汉失陷,面对当时的政治时局,柯岗决意赴延安投奔中国共产党,他的打算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在柯岗和妹妹熙如临行前,其父写下了饱含革命激情和骨肉亲情的诗篇相送。1938年年末,柯岗兄妹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而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5月毕业。毕业后被派往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警卫团任教员,后调至八路军一二九师宣传部工作,主办该师的《战场报》,此后一直生活在部队中,直至1957年因病转业。20世纪30年代末,在随军转战太行山区的战斗间歇,他写下了几十首小诗,后来将



柯 岗

这时期已经发表的三十二首诗结集为《战地短歌》出版。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柯岗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0年在太行山《新华日报》发表诗歌《采椒》,描绘了边区人民自由欢乐的劳动场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沿着毛泽东指引的创作道路毅然前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战地生活的锻造,使他成长为一名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战士和军旅作家。他把深入战地生活作为自我改造和文学创作的必经之路,以笔为武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功绩和英勇事迹,鼓舞人民追求胜利和光明。在战火纷飞的战役战斗间隙,他向人民奉献了《不屈的人们》《不可摇撼的心》《北流寺歼灭战》等报告文学作品,更于1943年秋创作了表现人民战士英勇抗日的小说《换头记》。

1946年,他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创办的《人民日报》编委,兼三版(农村)和四版(文艺)的主编。在创办《人民日报》期间,陆续发表十多部短篇小说,后编入195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三千七百万零三十元》中。1947年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懂得了为什么》一文,讲述了俘虏兵邹忠秀成长为战斗英雄的故事,回答了当时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采访时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俘虏为什么能很快成为战斗英雄?1947年7月,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老区红军老妈妈一家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红军的妈妈》,被刘伯承称赞,并连续多日在延安广播电台播放。1948年,调任第二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部长兼新华支社社长,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49年,随军渡江,参加了解放江、浙,进军大西南的战役。

新中国成立之初,柯岗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化处副处长,不久随军入藏。此后几年中,一直活跃于四川、西藏和云南一带。1957年转业后,在四川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978年,柯岗被调到文化部,任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83年,受命编写《刘伯承传记》,初稿完成后,因患高血压离休。2002年4月21日,在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代表作品

《换头记》(小说)

短篇小说《换头记》作于1943年秋,后被收入198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小说卷》。小说反映了人民战士英勇抗日的故事,描写了日本军人、汉奸对中国人民惨无人道的凌辱、迫害,还描写了中国人民在压迫中的怒火和抗争,尤其突出了抗日军民对八路军的热切期盼、勇敢掩护和无私的支持,揭示了处于人民战争包围中的日本侵略者必然灭亡的下场和命运。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惊险、曲折,引人入胜。

《长着翅膀的朱银马》(诗歌)

《长着翅膀的朱银马》初创于1945年,改定、发表于1950年,是一首近五百行的长诗,包括序诗、正诗、尾诗。序诗运用比兴手法,由“天上星星一万行,地上山歌万万章”,自然唱出“这首山歌在太行,太行英雄遍山冈”,“太行山的人民把英雄唱,唱一个英雄长了翅膀”。接着通过背粮、阻击敌人、宣誓入党、坚持反“扫荡”等真实而神奇的斗争事迹的描绘,尽情歌唱这位长了翅膀的英雄。尾声回应序诗:“天上星星一万行,一人写诗万人唱,写诗不写花儿红,唱我们的英雄长翅膀。”全诗往复咏唱,回音旋绕,韵味无穷。



《长着翅膀的朱银马》
书影

《金桥》(小说)



《金桥》书影

《金桥》于1957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柯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军旅题材小说的典范之作。小说以我军修筑康藏公路为题材,生动而又细致地描写了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和医务人员,在开辟康藏公路过程中艰苦忘我的劳动和坚韧无私的优秀品质,歌颂了中国人民子弟兵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也反映了藏族人民对人民解放军和领袖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它是一曲气势磅礴、真挚感人的英雄赞歌,具有可贵的革命传统教育意义。

自述与文论

我的创作历程^①

柯 岗

回头,追寻自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足迹,很清楚地看到,从爱好、阅读文学作品到提起笔来写作,到自觉确定以文学创作为终身事业,这期间,接受并理解“文学就是人学”的主张,是很容易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文学作品是要通过人的社会生活去写人的。但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的人是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不同的政治倾向和美学观点的,也就是鲁迅先生指出的“焦大绝不会爱林妹妹”的问题。于是,便生出了非解决不可的写

^①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4期。

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创作为谁服务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像理解“文学就是人学”那么轻而易举,因为它和作者的世界观、政治倾向和美学趣味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我是30年代中期并非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由于酷爱文学,在阅读我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被党所领导的伟大学生运动卷入了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但直到1939年我从延安出发,到华北敌后威震敌胆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作,成为一名宣传工作干部的时候,仍然没有解决好怎么写和写什么,也就是文学创作为谁服务的问题。

1941年,邓小平政委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报告中,曾明确指示我们:“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对于这个落地有声的教导,我和我的工作同伴们无不心服口服,不折不扣地理解、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敌后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顽固派——之间的斗争,表现在文化领域也是十分尖锐、十分鲜明的。理论和面前的实际相印证,更进一步地坚定了我们抗日救亡的信念,明确了自身的职责,大大增强了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于是我们能写的就拼命写,会唱的就拼命唱,会演的就拼命演,自以为满腔热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责任,不遗余力地为抗日军民服务了。但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感情没有转到广大抗日军民方面来,自己的好恶同他们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从而未能认真思考、仔细观察自己的工作效果,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为谁服务、怎样服务、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结果事与愿违,舞台上出现了大、洋、古。在军民同命运,与日寇短兵相接、生死搏斗的短暂间隙里,在严寒冰封的丛林峡谷之中,让群众深夜不眠,来观看我们演出的外国大型话剧《钦差大臣》《谁的罪恶》,京剧《拾玉镯》《法门寺》,等等,难怪群众啼笑皆非地反映说:“你们演的可真‘冻’人啊……”唱歌的人在教战士们唱:“月儿弯弯影儿斜呀,呀哟一个呀哟……”对此,刘伯承师长激动地批评说:“我听到这种歌声,惊心动魄啊!难道这也能是军人唱的歌吗?!为什么不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像苏联的‘假如明天战争,我们今天准备了斗争’那样的歌!”我自己写的诗歌和报告文学,不仅语言文字全然是洋腔洋调,而且满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梦幻情趣。诗歌摆脱不了《严寒通红的鼻子》和《高加索的俘虏》的影响;战斗通讯看不见我们战士们前仆后继,忘我冲杀,灵魂深处强烈的爱国主义原动力,总想在太行山上找个类似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工作有暇,不会同士兵们促膝谈心,只会是在树林里独自个漫步,嘴里还小声哼唱着:“一个年轻的兵,站在她窗前……”看到群众在被日寇焚烧过的家屋废墟上哭泣、咒骂,自己反而背诵莱蒙托夫的诗句:“没有痛苦算什么生活,没有风暴算什么海洋!”并以此去表达格格不入的同情!这一切,活生生地说明了当时我和我的某些文艺同行们确实确实没有解决文艺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我们的思想感情,全然徘徊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里,同广大工农兵劳动人民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同当时敌后你死我活的战斗生活是很不协调

的。我们感觉到陷入了苦闷的深渊！

1942年红五月来临的时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急于把他们在华北的占领区变为支援他们侵略战争的可靠基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寇大肆推行“三光”政策，解放区军民前仆后继地抗击，战斗极端频繁而残酷！当我们在隆隆炮声和太行军民愤怒的喊杀声中，从泰然自若、坚如磐石般站在山垭青松之下指挥战斗的左权将军身边走过，不到一个时辰，将军就在他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光辉的生命！将军的热血激荡着太行山千山万壑，激荡着太行军民的心。他们不约而同地随即唱出了这样一首歌：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为了中国革命苏联去留学，
回国以后当军长又当参谋长。
狼吃的日本五月扫荡咱辽（县）东，
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
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
咱们左权（辽县后改名为左权县）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

这首迅速出现、饱含无限真情实感的群众歌曲，在创作上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震动。我们开始感觉到只凭自己的苦思冥想，不到群众中去，要想懂得群众需要你写什么和怎样写简直是缘木求鱼！

正在这时候，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我们在党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认真讨论。研究之后，有如拨云雾而见青山。它告诉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是为广大的革命人民，首先是为革命的工农兵服务的，同时革命文艺工作的源泉也必须是广大的革命人民和工农兵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由于文艺工作是以艺术形象去感染和教育人民群众的，所以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就必然首先是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去观察、思考和体验，同时也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爱憎、希望一致起来，而后才能抓住人民群众中各种各样、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一句话，革命的文艺工作，是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个体劳动的群众事业，离开群众，闭门造车绝不会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五光十色、繁杂纷纭的，因而人们的性格、形象和内心世界也是多种多样的，作者不到群众中去扎扎实实地生活，不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手拉手地并肩生产和战斗，不把革命群众的革命事业同作者的命运无间地融合起来，要想真正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性格是很困难的。

归根结底,我认为《讲话》不仅告诉我们革命作家应该写什么,怎样写,而且告诉我们怎样成为真正的革命作家、人民战士。《讲话》让我们牢记文学艺术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政治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一论点,你可以用这种政治去攻击那种政治,但是,世界上全然脱离政治的文学艺术是不存在的。因而,所谓“淡化政治”“离开政治远一点”的理论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

我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创作道路,从40年代开始,在华北敌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血与火的拼搏中,自觉地把文学创作当作杀伤敌人,保卫人民的武器;把深入人民战士训练、作战和军民互爱、火热感人的战地生活,作为自我改造和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过程,开始发表作品,也同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战士。从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日日夜夜激荡着我的创作冲动,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我的作品大都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役战斗间隙中完成的。许多短诗、短文和素材,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地和追击行军的马背上草成或记录的,因而初稿、资料,毁于炮火、雨雪者不计其数;加之十年“文革”,反复抄家,被“造反派”践踏、焚毁、抢劫,散失许多,现集五卷,实为劫余之作,作为半个世纪的创作成果,实在微不足道!



怀念老友柯岗^①(节选)

李庄

我和柯岗已经相识六十多年,从最初认识之日起,就是坦诚相交、无话不谈的朋友。不管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或是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的非常时期,哪怕不在一个根据地或一个城市,哪怕数年未曾谋面或不通音讯,我们也一直是心有灵犀、肝胆相照的战友。

张柯岗于1915年生于河南巩县,我于1918年生于河北徐水,都是北方人,比较起来,他更是豪爽、直率。他虽只比我大两三岁,但水平高出许多。因为在参加革命前,他已于193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我却只是个农业中专的学生。虽然我自认学习也很勤奋,古文和历史的底子不错,但比起柯岗,从学识、涵养、气度等方面,还是自愧弗如。可见知识的系统学习和长期积累,确需真功夫。所以我一直把柯岗当兄长看待。

我和柯岗从抗日战争初期就已认识,因为我们都在太行根据地。柯岗在一二九师政

^①李庄:《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457页。

治部宣传部工作，我在中共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做记者。那时柯岗只有二十六七岁，却已有相当的文名。我在报社也常写些通讯，甚至小说和报告文学等。革命队伍中的人，本就亲如一家，我两人年龄相仿，又都“舞文弄墨”，更是相见恨晚，所以很快熟识起来。后来一二九师和太行分局从山西武乡县移驻河南涉县，师部住赤岸村，柯岗所在的政治部住王堡村，我所在的《新华日报》住七原村。几个村子傍着风光秀丽的清漳河，前两者在河东，后者在河西。绿树农舍，相当安静，夜间可互闻犬吠之声。我和柯岗离得近了，更多了来往和谈心的机会。印象中清漳河有些暴性，夏季涨水，奔腾咆哮，声势夺人。冬天枯水，在河床里垫上石头，又往来如履平地。可不管河水是涨是枯，都阻隔不了我和柯岗的交往。

我和柯岗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42年，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当时中共中央在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明确提出再用两年时间打败日本侵略者，有如石破天惊般地振奋人心。为了鼓舞太行区根据地人民的士气，中央决定为刘伯承师长做五十大寿。祝寿活动需要有个文字介绍，如年谱、事迹等。采访和撰写的任务，落在了柯岗和我的头上。

在太行根据地，提到刘师长，就意味着胜利，体现着光荣，这是根据地军民的共识。革命队伍中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跟着刘师长反‘扫荡’，晚上脱衣服睡觉都不害怕。”为刘师长做寿是人心所向、万善同归。我能参加这次采写任务，亲聆刘师长的教诲，也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刘伯承将军很随和，尤其对年轻人，更是个蔼然长者。但带我们俩前往的李达参谋长说明来意后，刘师长的语调就不那么随和了。他说：“大家都这么忙，谁出的这么一个主意？一个人有生死，都生一回，死一次，中国有多少亿人，写得完吗？我不过是一个兵，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你们要写就多写军队，多写人民，多写杀敌英雄。好了，大家都很忙，就到此为止吧。”李达将军再三请求，刘师长执意不谈。我当时虽着军装，到底不是部队的人，又年轻，大着胆子说：“师长，我们是领了任务来的，您不谈，叫我们回去怎么交代呀？”刘师长听到“任务”两字，略一沉吟，又对我们说：“那好办，我给蔡树藩、陈克寒打电话，不干你们的事，不算没完成任务。”

比起我的沉不住气，柯岗就沉稳得多了，虽然也说不动师长，但他不着急，也不走。还是李达参谋长到隔壁请来了邓小平政委。小平同志的态度明快，话语干脆，他说：“师长，我看还是要讲呀。这也是工作，而且是中央决定的嘛。没有年谱、履历，没个文字介绍，咋个祝寿嘛？他们已经来了，师长就谈谈吧。”

刘师长听了邓政委的话，变了态度，说：“要说这是工作，是任务，我就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嘛，个人无话说的。”

刘师长一答应谈，就谈得非常认真，而且从写文章的角度着想，把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思想演变、经验教训等都详细地做了介绍，帮助我们两个年轻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柯岗和我采访后，合作写了长篇通讯和刘伯承传略。柯岗反复修改，他的政治水平和文字修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两篇文字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和一二九师的《战

场报》同时刊登,在大行根据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日本鬼子投降后,解放战争开始前,解放军有些建制发生变化,柯岗被《人民日报》总编辑张磐石点名请来,短时间调到报社当编辑。这是我们两人为时不长的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光,能与他朝夕相处,共同工作,我当然大喜过望。当时编辑部主任是袁勃,然后就是柯岗和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编辑。报社有四名记者,我是领导,其实就是首席记者,采写的稿子最多。我有个习惯,写通讯喜欢尽可能描写几句,认为这样可以“出彩”“生色”。没想到那位年纪大的编辑对此看不惯,甚至厌烦,见了就删。柯岗有时不同意,认为删了确实使文章减色,为此还发生小争执,几次都说得不欢而散。以后我知道是由我而起,就釜底抽薪,写通讯再不描写或渲染。柯岗没多久发现了此事,对我开玩笑说:“怎么不声不响了,如此息事宁人啦。”我就打哈哈说:“惹人生气必自毙。”

柯岗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为人正直,性格直爽,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对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时不顾及对象和场合,只要自己觉得对工作有好处,就当面说,甚至不惜争论。这本来是个大优点,但在某些人的眼里却成了“缺点”,有时因此而得罪人。记得1947年元旦那天,是我的新婚之夜。当时报社已从山边的南文章村搬到深山里的河西村,是个很小的村子,晚间极静。待闹房的、起哄的同志们都走了,时间已该就寝了,柯岗却一个人走了进来。那时我的烟瘾正大,柯岗也是位“老枪”,我们两人抽着烟,就着白开水,促膝谈心,说起来就没个完,把新娘子培蓝都熏得受不了了。慢慢谈到彼此的性格,柯岗自己说:“我的性格好琢磨,凡事挂在嘴上,有什么说什么,恐怕得罪了不少人。不过也很有人喜欢吧,直性子嘛。”我和他略有不同,因为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在革命队伍中要有个改造意识,似乎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处事非常谨慎,有时很难明说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就有一些人认为是个“和事佬”。柯岗却对我说:“只要交往,不用多少时间,谁都能了解你,心地善良,好善勿恶。少数人的看法会变的,不必管他。谁叫你生在封建地主家庭,又是五房中的长男呀。”听了他的话,我默默无言,心里真是感到温暖和宽慰,自己对自己说:知我者,老柯也。

柯岗在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按说与总编辑张磐石相交也不多,但关系特别好,就是因为柯岗的这个特点。磐石是老革命,又曾留学日本,资格老,水平高。但也有个习性,就是脾气大,好训人。我长期在他手下工作,他比较了解我,也算器重我,在报社从未训过我,但他真正喜欢的是柯岗的“直性子”,有话就说,说完就完,从不惹是非和麻烦。我就多次听到磐石在报社说:“我就喜欢张柯岗这样的干部。”而柯岗也用磐石对我的器重鼓励我。记得我采写的《为七百万人民请命》的通讯刊登在194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号的一版,我自己还没什么特别感觉,柯岗却鼓励我说:“这篇通讯写得不错,连邓小平同志都表扬了。你没见这两天老磐石那么高兴,整天喜滋滋的,也不发脾气了。继续努力吧。”这种政治上、精神上的互相关心和支持,确能给人极大的力量。就是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交往,我与这两位老大哥成了真正的知己,我们之间的默契和情谊,真的是至死不渝。他们两人先我而逝,缅怀和思念的隐痛却留给了我。

柯岗在报社到底没有待住。以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他又被调回二野宣传部,很快随大军南下,挺进中原,一直打到大西南。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柯岗一手握枪杆,一手以笔作枪,写下了大量的作品,陆陆续续发表,出了不少著作。近年又辑录整理,精编刊印了《柯岗文集》五大本。我曾以为这是他的封笔之作,谁知他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与夫人、著名作家曾克合著了《战犹酣》和《比翼齐飞》等大作。论起在文化艺术创作方面的成就,他也远远高于我和许多相同经历的同志。

柯岗念旧,人又厚道,决不趋炎附势,更无势利白眼,所以朋友非常多。他一直是二野的,长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自然与这位老首长有较多接触。他不因小平处于高位而有所求,也不因小平挨整而躲闪回避。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去看看老首长,特别是小平倒霉的时候。这也是他能受到小平信任的原因。

纪念柯岗同志^①(节选)

贺敬之

柯岗同志出生于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巩义市。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义无反顾地放弃继续深造,投入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1939年年底离开学校,分配到十八集团军总部警卫团。不久,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做过宣传干部、文化教员、情报站长、报纸编辑、战地记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军转战南北,参加过百团大战、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新中国成立之后转为专业作家,潜心从事文学创作。

从1940年发表诗歌作品,到2002年逝世,柯岗同志度过了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他的创作领域广阔: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等均有所能。作为人民作家和革命军人,他的视线始终集中于革命军事题材。1957年因健康原因转业后,仍然执着地从事军事题材创作。著名长篇小说《逐鹿中原》《三战陇海》,都是在他脱下军装之后完成的。《金桥》写的是建设康藏公路,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是军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以古稀之年,和他的亲密伴侣曾克合作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战犹酣》,生动地记述了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指挥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从开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宏伟历史。他的作品,大多数是写他亲身经历的生活。不平凡的人生阅历,给他提供了广阔而生动的创作素材。宋任穷同志在《柯岗文集》序言中说:“这些作品,有着浓郁的战斗生活气息,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故事情节真实感人,记载了人民中国诞生过程中一些闪光的历史场景,无论对于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或是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都具有激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这是值得欢迎的。”可以说,他是我国革命军事文学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

^①贺敬之:《贺敬之文集·文论卷》(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564页。

关于柯岗的小说,许多同志写过文章,肯定了它们的重要意义。我以为,他的散文、特写、诗歌也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这些作品有许多是在战斗的间歇写出来的,有感而发,不加雕饰,直叙其事,直抒其情,质朴诚挚而意味深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体现作者的独特风格。他在特写中对人物的勾勒,寥寥几笔,就把人物的精神风貌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艺术功夫令人佩服。《刘帅印象记》是柯岗的名篇,叙述了作者和刘伯承同志的几次接触,不但披露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对刘帅的精神境界也开掘得很深,读来使人热血沸腾。没有对革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和深入了解,是写不出这么精彩的文字来的。《红军的妈妈》写解放军来到大别山的一个村庄:那里曾是革命老区,一处墙上还残存着红军在十八年前写的标语,可是部队进村后,竟然见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一位瞎了眼睛的老妈妈领着小孙女在等着队伍到来。原来红军走后,这里惨遭白匪血洗,几乎家家都有被屠杀的冤魂。直到解放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当局还留下告示,“谁和共产党见面,杀绝满门”。当老妈妈让孙女去喊儿媳,告诉乡亲红军不走了,女孩大声呼喊之后,树林里响彻“红军不走了”的声音,人们蜂拥而回。全文一千一百多字,没有任何多余的笔墨,军民的鱼水情,十八年的苦苦等待,几笔就勾勒出来了。

作为写诗的人,柯岗的诗歌给了我许多启迪。我在延安鲁艺上学的时候,他已经是饮誉军旅的诗人了。臧克家老人很赞赏柯岗同志的诗章,他在读柯岗诗作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诗,《采椒》和《长着翅膀的朱银马》《他们为人民而战》等,已成为相当有名的诗篇,唐弢还为《采椒》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了一段欣赏文字。就总体而言,我觉得柯岗同志的诗写得有真情也有实感,不是简单记一事一人,诗句多系自然流露,平易近人。”我很赞成臧老的意见,臧老特别推崇他的《采椒》《长着翅膀的朱银马》《他们为人民而战》。我记得还有一首《茶棚》,也很耐人寻味:

月亮明光光的,
路边搭着蓝布棚。
多大的炉灶摆在当中,
孩子们不停地添水。
老人们把开水晾在碗里,
又把冷水打来一桶。
子弟兵静静地走过,
整夜不停。
他们把开水一碗一碗往兵们手里送,
直到天明。

这首写于1945年4月的诗歌近于白描,却饱含着深情。多么难忘的岁月!多么美好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读着这首诗,使我感慨不已,心潮难平。

柯岗同志长我九岁,我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文艺战士。由于他很早就奔赴抗日前线,我们在延安的见面机会很少。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南工作,也无缘多有来往。粉碎“四人帮”后,他和曾克同志迁居到北京,我们之间的接触机会多了。见面交谈的话语虽不多,但却能心心相通。在我心目中,这位令我尊敬的老大哥身上有很突出的两点:一是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没有出于个人的积怨,更没有因此产生对革命的怀疑和忏悔。他冷静地对待党的失误,一如既往地忠诚于党的事业。再就是坚定不移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而放歌。他不贪图个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地为党和人民工作。晚年,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中的严重问题深怀忧愤,出于公心。作为人民的作家,他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实实践者。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力求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力求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民群众。作为党员文艺家的柯岗同志,不论是个人命运、文艺事业和整个革命事业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改初衷,坚守宗旨,老而弥坚。这是我们最应珍视,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发扬的。

2003年1月20日

创作及文学活动年表

1937年6月底,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伙同曾克、黎辛出版《争存》半月刊,继而改为《开封学生》。

1938年年底,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0年,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任文化教员,后调师政治宣传部,办部队报纸《战场报》。同年,在太行山《新华日报》上发表处女作诗歌《采椒》。

1943年,创作短篇小说《换头记》。

1945年,创作长诗《长着翅膀的朱银马》。

1947年,发表了《他懂得了为什么》《红军的妈妈》等报告文学作品。

195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三千七百万零三十元》。

1952年,与曾克合作出版了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

1953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风雪高原红花开》,短篇小说集《八朗里和五金河》。

1954年,出版诗集《长着翅膀的朱银马》《小诗集》,短篇小说集《边疆》等。

1957年,出版描写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金桥》。

1958年,发表小说《柳雪岚》。

1961年,出版描写淮海战役的长篇小说《逐鹿中原》。

1977年,出版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三战陇海》,在《人民戏剧》上发表了与曾克

及重庆话剧团集体编写的话剧《针锋相对》。

1980年,出版电影文学剧本《历史的转折》《中央突破》,短篇小说集《柳雪岚》,散文集《军中琐记》。

研究综述

柯岗是我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军事文学作家。他南征北战二十多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军西藏、抗美援朝等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他的作品,源于切身的的生活体验,以人民军队、战争为创作题材,描写了战争和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战斗生活气息浓郁,形象鲜活生动,情感真诚自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具有激励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对于柯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柯岗作品的研究。柯岗创作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等多种样式的文艺作品。对于其作品的研究,既有单篇作品的解读分析,也有某一文类作品的概括总结,还有对其创作的综合论述。像《我读〈金桥〉》《富有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诗篇——读柯岗的长篇小说〈金桥〉》《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读柯岗的长篇小说〈金桥〉》等文,细致剖析了《金桥》的题材表现、主题思想及人物刻画等方面的特点,肯定了作品的英雄主义特色。除《金桥》外,研究者也对《逐鹿中原》《三战陇海》等小说进行了主题解读和艺术形象剖析。马尚瑞的《柯岗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从语言运用、情节悬念、刻画人物的多样手法等方面解析了柯岗短篇小说的魅力所在。刘凤艳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诗史——柯岗创作论》和童庆炳的《抒情寓含叙事 叙事寓含抒情——柯岗文学创作的美学特征》分别从社会学和美学角度对柯岗的创作进行了总体解读。此外,研究者对柯岗的诗歌、散文、歌剧、影视文学剧本等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关注。总体看来,对柯岗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上,而且切入点和方法比较单一,观点和认识也有待于更新、深化。

二是对柯岗生平事迹及创作道路的回忆、述评。为纪念柯岗逝世一周年,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编著了《柯岗:人、文永生——柯岗纪念文集》一书,书中辑录了大量回忆、悼念柯岗的文章。柯岗的亲友、战友、文友等怀抱着对他的认识理解和深切思念,回顾、讲述了他的军旅生涯、战士品格、人民情怀和军事文学追求等,为我们全面认识柯岗其人其作、把握他留下的财富和贡献等提供了有力的参照。

三是对柯岗遗著、书法作品及其文友、读者来函的史料收集。《柯岗:人、文永生——柯岗纪念文集》一书,不仅收录了柯岗散发于各种报纸杂志而未及收入《柯岗文集》的部分文稿、讲话、书信等,还辑入了他的部分书法作品以及他保存的五封珍贵的文友和读者来信,这些文献史料为柯岗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其中,柯岗遗著中辑录的《我的创作

历程》一文,回溯了作者来延安前后,尤其是《讲话》发表前后自己在创作思想和观念上的变化,强调了《讲话》与自己人生和创作道路的密切关系,是我们了解延安时期柯岗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料。

总之,目前为止关于柯岗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对他延安时期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主要研究论著索引

一、专著、文集、史料

1. 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 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 巩县志编委总编辑室. 巩县文史资料(第5辑),1983.
3. 中国延安文艺学会. 柯岗:人、文永生——柯岗纪念文集.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二、文章

1. 马戎. 我读《金桥》. 红岩,1958,(6).
2. 石也. 富有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诗篇——读柯岗的长篇小说《金桥》. 红岩,1959,(6).
3. 夏芒. 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读柯岗的长篇小说《金桥》. 红岩,1959,(7).
4. 陈衍俊. 捷报声中读《金桥》. 读书,1959,(12).
5. 刘凤艳. 人民革命战争的诗史——柯岗创作论.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6. 任晓路. 柯岗:我写最美的人. 中华英才,1995,(20).
7. 宋任穷. 谈柯岗.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4).
8. 纪鹏. 战地画卷 烽火诗录——《柯岗文集》第一卷(诗歌、散文选)读后. 西南军事文学,1998,(5).
9. 魏巍. 衷心的祝贺——在柯岗创作55周年及《柯岗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流,1996,(5).
10. 路卫国,阿军. 跨越世纪军旅情——访老作家柯岗、曾克夫妇. 八桂侨刊,2004,(3).

柯 蓝

传略

柯蓝(1920—2006),原名唐一正,笔名倩萍、蓝雨、木可等,湖南长沙县人。小说家、散文诗人。1937年冬,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延安群众》报社当过记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劳动报》副社长兼总编,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专业编剧,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红旗》杂志文艺部负责人、编审,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柯 蓝

柯蓝于1920年3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唐贻承与徐特立等是同乡、挚友,并曾共同开创了湖南长沙新学运动。柯蓝在“革命”父亲的熏陶和教诲下长大,从高小毕业后先后进入湖南私立楚怡中学和湖南兑泽私立高中读书。中学时期以“倩萍”为笔名,在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第一首散文诗《世界上最小的鸟》,文学才华初露锋芒。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人的影响,他的革命意识也逐渐萌芽。1935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不仅在校发起进步学生读书小组,还先后向长沙《力报》《民国日报》投稿,宣传抗日救亡和进步思想,并以省会学生文艺社团戍地文艺社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工作。



柯蓝与王文秋在延安

1937年,在徐特立的支持和介绍下,柯蓝组织部分文化人和学生赴延安参加革命,到西安后又与同学李源去了山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2月,他来到圣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被选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1939年年底,经组织同意,他带职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不久与鲁艺美术系学生王文秋结婚。1940年,他第一次以“柯蓝”的名字发表散文《牛车上》,刊载于重庆《国民日报》副刊上。1941年,从鲁艺毕业后不久,他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大众工作委员会和

《边区群众报》工作,担任过记者、编辑、主编和新华社战地记者。1942年2月,创作的新体诗《小盲女》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以后陆续在该报发表小说、散文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柯蓝饱受鼓舞和激励,长期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努力向民间文艺学习。当时在延安,由秧歌舞发展而来的秧歌剧深受群众欢迎,并在为抗战和为人民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给柯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①,更深化了他对党的文艺政策的理解,他下定决心从事文艺普及工作。不久,他鼓起勇气用旧小说章回的形式,开始写作反映抗日英雄的中篇通俗小说《洋铁桶的故事》(最初以《抗日英雄洋铁桶》的篇名连载于延安《边区群众报》上),这部小说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领导的热情鼓励,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紧接着他又结合自己在群众生活中的真切体验,并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在延安创作并发表了反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中篇小说《红旗呼啦啦飘》,同样在群众中反响热烈。此后几年,他经常下乡搞文化宣传工作,并与名艺人韩起祥等合作,进行反封建迷信的宣传活动^②。此外,他还创作了多篇小说及散文诗,并进行了民间文艺的搜集工作,如搜集了陕北民歌《蓝花花》等。

延安生活是柯蓝生活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珍视和日后时常回顾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了多篇忆述延安的文章,如《回忆我在金盆区山地》《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杂忆延安之一》《我爱延安的秧歌剧和腰鼓》《延安生活与我所喜爱的通俗文学》等,充分体现他对延安的“一往情深”。

1949年上海解放,柯蓝即在上海《劳动报》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为了追念王孝和同志,他与赵自合写了传记体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之后,任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处长、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上海市文协党组书记等职,还创作了许多颇具特色的散文和散文诗,如结集出版的《上海散记》《火车上的少校》《新的生活在等着》《早霞短笛》等。



柯蓝作品

1958年冬,柯蓝回原籍湖南体验生活,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之后创作出《蒿铁头红旗不倒》《马戏团的秘密》《暴动》等小说。1963年,落户长沙,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其作品《三打铜锣》《竹楼夜话》《起飞的孔雀》先后发表、出版。

1978年,柯蓝被调往北京工作,任北京《红旗》杂志社文艺部主任、编审,同时其重心也转移到散文和散文诗的拓展上。他发表于1980年的散文《深谷回声》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黄土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2006年12月11日凌晨,身患癌症的柯蓝经医治无效,在深圳北京大学医院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①关于柯蓝对延安秧歌剧的深厚情感,他曾在回忆文章《我爱延安的秧歌剧和腰鼓》中有具体描述。柯蓝:《我爱延安的秧歌剧和腰鼓》,《中国通俗文艺》,1982年第5期。

^②柯蓝将此段经历写成了散文《和韩起祥下乡》。柯蓝:《柯蓝散文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279页。